

回流农民工的变化

——基于对返乡打工妹的考察

孟宪范

内容提要 不同于男性农民工的连续打工经历,女性农民工外出是阶段性的。她们返乡多缘于承担生育、抚育任务。打工妹返乡后承担了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并为家庭角色注入了新的因子。她们是农村基层细胞变迁的媒介。此外,她们生活方式和精神层面的变化又是提高农村社会文明水平的推手。

返乡打工妹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但大批打工妹返乡是逆城市化现象,不是大方向。

关键词 农村 流动人口回流 打工妹 变迁

孟宪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100044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出现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会返乡。中国农民工的返乡是体制性现象,它反映着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迁移障碍,即流动的阻力^[1]。因此,返乡农民工这一群体就包含了丰富的体制性内涵,并显示了其研究的意义。

中国流动人口至今已超过1亿,其中相当部分是女性^[2]。那么,女性农民工回乡后的状况如何?打工生活使她们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她们给家乡又带来了什么新风?这是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一、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概述

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不同^[3]。国际上视迁移人口与永久居住地的变更有关,而流动人口则是在中国

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不过,国际上将类似的群体称为“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因此,我们可以大略将流动人口视为迁移人口中的一个分类。基于此,我们来借鉴有关研究成果。

1.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6年所作《国际移徙与发展》是对国际范围的人口流动现象进行的论说。围绕本研究,该报告的下面几点值得关注:(1)该报告明确肯定了流动与发展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对于东道国和原籍国,“移徙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机会。”(2)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是缺乏研究的领域。它指出,回流的研究在世界上也是“移徙现象中研究最不充分的方面之一。”(3)肯定回流者的作用:“所有移徙者都可以成为变化的媒介”,这

本文系笔者作为项目第二负责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返乡打工妹国情考察》(2008-2009)的阶段性成果

包括专门知识和积蓄,发挥教师或训练员的作用,成为技术工人中的关键成员,以及在本国启动新企业,促进经济发展。(4)至于女性的回流,该报告指出,它与生命周期中的家庭角色相关。移徙妇女尤其会回到原籍国停止工作赚钱,“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4]这一报告为我们认识中国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背景。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8 年进行的“百县农民工回乡创业调查”^[5] 该调查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报告指出:(1)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主要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平均年龄为 39 岁。(2)回乡农民工半数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小城镇创业和居住。(3)回乡农民工不仅是农村带头致富和带动群众致富的领头人,是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推动者、开拓者,还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后备力量。在被调查的 301 个村中,168 个村共 505 位返乡的打工者担任过村干部。

3. “有流动无迁移”的结论 盛来运在他的专著《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分析》中^[6],抓住中国人口流动与迁移分离的特有现象指出,中国城市化滞后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为“有流动无迁移”。特别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之二:回流”一章中,专门对返乡打工者的状况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下降者更容易回流。其对流动人口及其回流的经济学研究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宏观背景和重要的认识前提。

4. 关于回流原因的分析 谭深基于全国妇联 2000 年第二次中国妇女生活地位调查的全国样本,对于回流农民工的分性别分析有值得注意的描述^[7]。关于回流原因,男性回流的第一位原因是“家庭原因”,占 37%;第二位是“工作原因”,占 23.9%;女性第一位是结婚/生孩子,占 46.9%,第二位是家庭原因,占 34.4%^[8]。可以看出,女性因为结婚生育而回流的几乎占到回流原因的一半。

5. 关于农民工返乡逻辑及返乡后适应能力的研究 袁松等撰《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9]运用生命历程的理论,对于不同年龄层级的农民工返乡逻辑,及返乡后适应能力的不同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上世纪 60、70 年代出生的返乡农民工角色适应能力强,适应过程困难不大;女性返乡农民工多因生育而返乡,她们也会在孩子略大后再次外出。

由于在现有研究中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城市融入及返乡原因的研究很多,但对他们返乡后的状况则缺乏研究,而对返乡打工妹就更鲜有研究成果

问世。因此,我们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返乡打工妹群体,并着重考察她们在携带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因子返乡后的生存状况。

二、关于我们的调查

1. 对返乡打工妹的界定 出自实际操作的需要,我们对调查对象“返乡打工妹”做了初步界定:

我们把农村户口、从事非农经济活动者,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外地就业,都算做打工妹;把确定不再外出打工的和调查时已回乡居住一些时日、且暂时无外出打算的打工妹均视为返乡打工妹,其年龄在 30-40 岁上下的第一代打工妹^[10]。她们大略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她们的家乡在中西部封闭的环境,年少时在贫困中度过。第二,她们现在是中年,多负有照顾老、小的责任。第三,她们经历过城市工业文明的洗礼。第四,她们经历了从贫困到初步小康的过程,相信未来,相信明天比今天好。

2. 拟回答的问题 在考察返乡打工妹的现状时,我们力求有历时性的视角,即根据生命历程的理论,我们把返乡打工妹的生命历程看作是一个连续的链条,每一个过程都给她们的身心留下痕迹,都会对此后的生命历程发挥作用。基于此,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她们回乡的原因是什么?返乡后的状况怎么样?打工经历与返乡后的状况有什么联系?打工经历给她们带来了什么变化?她们给农村带来哪些变化?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期望?

3. 关于我们的调查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1 月期间,我们分别对安徽省肥东县,江西省玉山县,河南省固始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原州区、西吉县,以及重庆市合川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地的返乡打工妹进行了调查。为了解她们的打工生活和她们的返乡机制,我们还到劳动力流入地东南沿海某地进行了调查。我们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妇联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工厂管理者、职业培训学校领导、打工者进行了多次座谈,重点是对打工妹及返乡打工妹进行了半结构的深度访谈,力求多层次、多角度地了解返乡打工妹的状况。

三、外出劳动力回流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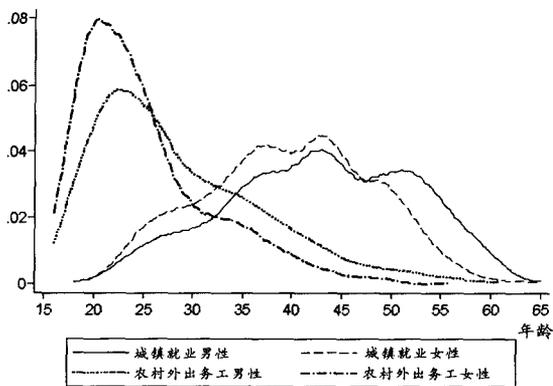
中国的城市化走着一条曲折、特殊的道路^[11],因而,作为城市化建设者的“农民工”这一群体值得关注。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历程中一个具有丰富经济、社会、文化内涵的群体。它诞生于中国持续多年

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壁垒开始松动之时,负载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双重因子,游走在城乡之间,挑战着城乡壁垒和社会公正,也向农村注入全新的工业文明因子。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部分,最终会回到故乡,不再外出,这部分人就是返乡农民工。

人口学将“返乡农民工”称之为回流人口。严格地说,“返乡农民工”不是学术概念,而是一种描述性用语。出自表述的需要,本文将穿行于两种用语之间。

中国流动人口的回流带有强烈的制度排斥色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包含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排斥,使得农村人口流动面临着系统性制度障碍,而这一制度长期的坚硬性,无疑是大量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质言之,进城农民工只在最优劳动力年龄段在城市就业,他们并不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得到的却是超低的工资,而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失去优势时即需返乡,回到缺乏社会保障供给的农村社会。

这一点在他们进入、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特征上表现突出。有学者对此做了分析。



2006年16-65岁正规就业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年龄分布按性别与户籍身份分组(样本核密度图)*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6年城乡住户家计调查样本中的子样本。总样本量为18071户、65281人;其中:农村10751户、43776人;城镇7320户、21505人。样本中的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为7971人,城镇就业人数为10918人。其中,“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村样本被定义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842(人);城镇样本中的非自雇者被视为正规就业者,样本量为10469(人)^[12]。

从上图可以看出:(1)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正规劳动力市场早,反映的是他们受教育水平低;(2)20-25岁是他们进入城镇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25-30岁就迅速下降。朱玲的分析表明,其直接原因是用人单位设置的年龄门槛:“据2007年的一项企业用工调查,将近60%的岗位要求雇员年龄在18-25岁

之间,将近30%的岗位的年龄要求要在26-35岁之间。”^[13](3)他们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年龄分布的巨大差别表明,城乡二元的就业、福利体制仍然顽固地发挥着作用。(4)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中两性相比,女性外出就业早(就业高峰比男性出现得早),退出得也早,表明她们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企业用工偏好更年轻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时间短。

那么,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特点是什么?有学者根据2004年国家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概括了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特点:(1)年龄越大,越容易回流。(2)男性回流比重高(他推测与年轻女工供不应求有关)。(3)配偶回流比重高。(4)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回流。(5)收入水平越低,越容易回流。(6)与在直辖市、外地区务工,在地级市和县级市务工的回流比重高。即那些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下降者更容易回流。

四、连续性和阶段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外出打工周期——研究发现之一

我们发现,男女两性的外出打工周期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是阶段性的。在劳动力输出地,男性一般是在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尽管打工地点、雇主经常变动,但打工历程是连续的,孩子出世也不中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我们奢侈的劳动用工制度,把35岁乃至25岁以上的劳动力排斥在外。这就造成劳动者(即“普工”)在难以找到他们能够胜任的或中意的工作时回乡。而能够继续留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较大的打工者多半具有一定的技术或管理能力。女性则不同。她们早早开始了打工生涯,早早因婚育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当然等孩子稍大后,她们可能再次外出。因此,大略说来,一般女性外出打工有两个高峰期:

第一个高峰期:初中毕业至结婚。这个时间约有4-5年,在20-21岁左右,外出打工妹会回乡结婚,婚后很快怀孕,于是就不再外出。直到第一个孩子3-4岁,可以交由别的亲人带了,这个阶段才告结束。

第二个小高峰期:第一个孩子3岁左右,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再次外出打工。这个阶段一般有3年左右,直到怀第二个孩子。这一点在上文所引朱玲图1中已经可以看出。该图表明,农村女性打工者在20岁后的急剧下滑曲线中,至30岁下滑速度突然明显变缓,30-35岁之间有一个缓坡。由于,这里的数据是针对正规就业者的统计,没有包括非正规就业者。而如果将非正规就业者包括在内,女性通过家庭团聚

的方式二次进城经商务工者当为数不少^[14]。在这之后,年龄增长、自身劳动力市场优势渐失及家务负担渐重的双重作用下,多数妇女会不再外出打工;也有少数妇女在第二个孩子3岁左右时再次外出打工。

盛来运基于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家中6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多,劳动力外出可能性下降^[15]。

中国打工妹的返乡原因,与世界女性迁移人口回流的原因相类,即与生命周期中的家庭角色相关:“因为她们再次承担了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

五、她们是农村版海归:变迁的媒介,文明的推手——研究发现之二

返乡农民工是乡村版的海归。他们兼有农业文明与工业/城市文明的双重因子,而获得城市文明因子的途径是:以农民的身份,嵌入工商社会之中,经受城市各种组织、特别是工厂这一工业社会基本社会组织的锻造,以及城市工业文明的洗礼。工厂打工经历的作用在于,工业文明包含的严格的劳动纪律、精细的劳动管理规则、技能标准、劳动指标、明确的奖惩规则、冰冷的经济理性,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集聚,把他们从农业文明中形成的人格打碎又重新组合。这使他们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生产技能、经营知识、职业素养、城市生活知识,以及对另一个精彩世界的了解,而且具有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许多新追求,人格上积累了现代性。打工经历在他们乡村文化上涂上了浓浓的城市色彩。他们是走在通向现代性人格路程上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人。

当他们带着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新质回乡,已经是“我已经不再是我”^[16]了。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期望值已经与流动前大大不同,另一方面,携带着新的价值观念和提升了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他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在农村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考察打工妹返乡后的状况时,首先遇到的是考察的角度。基于通常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下面我们就先从这两个角度对她们返乡后的状况进行讨论;之后,再从女性在生活方式现代化中的特殊作用出发,审视她们生活方式文明化的状况;最后,分析她们精神层面的变化。

1. 积极的社会角色 调查发现,得益于打工生涯,返乡打工妹这一群体在家乡充当着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就我们调查所得,他们是农村社会中的活

跃分子,承担的社会角色有企业家、经纪人、自我雇佣小业主、在家乡继续打工、村干部等几种类型。

(1)企业家。这类人是极少数,她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家乡毗邻发达地区,得益于辐射效益,有较多的经济机会。例如江西省玉山县与浙江衢州地区毗邻,距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省义乌市只3-4个小时的车程,创业机会多。第二,自身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打工过程中打开了眼界,学习了企业的生产管理经验以及社会交往的技巧,个人知识结构和技能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得到极大提高。第三,打工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社会资本。

(2)来料加工承包人^[17]。这里的“来料加工”,指工厂将一些不需要特定设备、主要靠两只手操作的手工加工程序分离出厂房,由分散的生产者在工厂之外完成。如义乌的制伞、生产各种饰品(珠饰、假发)、手工艺品等企业,将缝伞、穿珠、编假发小辫等工序外包。这种生产方式就需要一种连接厂方和分散加工者的组织管理者或来料加工承包人。需要懂得相关生产流程的技术、产品规格,有管理能力、管理经验,善交往等。

(3)自我雇佣小业主。这里指返乡打工妹在家乡的镇子上开办澡堂、小照相馆、复印社、小饭馆、小卖部、小化妆品店等,属于小成本、小规模的服务业,自己和家人经营,或雇用3-5个人^[18]。由于她们有打工经历:第一,熟悉市场,掌握经营小型服务业的知识技能,积累了必要的人脉。第二,具有发展意识和捕捉经济机会的意识。例如,多个打工妹在得知老家乡镇正在开办开发区时即决定返乡开店。第三,外出发现自己的兴趣,返乡依照自己的兴趣开店。如江西省玉山县有位小陈,外出打工时发现自己很喜爱摄影,就自费上了一个摄影学习班后回乡开了个小照相馆。

(4)在家乡继续打工。这类返乡打工妹的家乡一般非农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定的就业机会。就个人而言,一方面,需要照顾家庭,或因亲属经济活动的需要等原因返乡,另一方面,自身又有一定的技能,因而返乡后又在家乡继续打工。

(5)务农兼村干部。过去,复员军人是农村干部的预备队,而今,这个预备队增加了返乡农民工的成分。打工妹外出,经受工业文明的洗礼,这使她们长了见识,心胸变得开阔,人际交往能力有了提高,更有可能在村庄里具有个人威信^[19]。我们调查中有相当多的返乡打工妹一边务农,一边当村干——多为妇女主任,负责计划生育。

2. 新型的家庭角色 相当部分的返乡打工妹没有在非农产业就业,也没有当村干部,而是回归农业体系,这里简称为全职家庭妇女。不过,这类家庭妇女角色已经与传统农村妇女的角色有很大区别,她们为其注入了诸多的现代因子。

(1)做全职家庭妇女的原因。这些见过世面的打工妹为什么回归传统的农村妇女的生活轨迹之中?调查发现她们正处于:①正处于育子繁忙期。②照顾家庭。或是为照顾老人,或是为照顾读书的孩子,特别是在孩子上到初中,需要管束的阶段。③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在劳动力市场无竞争力。④家乡非农产业不发达,缺乏就业机会。

(2)为传统角色注入现代因子。母亲、儿媳,是妇女传统的家庭角色。返乡打工妹回乡,即便仍然是母亲、儿媳,也已经为其注入现代因子了。这主要表现在极其重视子女教育与对婆婆的宽容上。

①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即在返乡打工妹身上,重视的强烈程度惊人。城市打工的经历使返乡打工妹深刻体会到教育对于人获得社会机会的重要性。在城市求职过程中,面对招聘单位对于应聘者知识、技能的明确要求,“找工作的时候吃了没有文化的亏”^[20]是她们深切的体验,因此,回乡后,她们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对于子女教育期望之强烈程度令人惊叹。

她们重视子女教育的表现有:其一,为孩子教育中止打工,即最终返乡的时间普遍在孩子上初中时。一般认为,孩子一旦上初中,学习成绩会直接影响其进一步的学习机会,同时,孩子此时也正是问题多发期,非常需要家长的管束。其二,极端的例子是变卖生产资料供孩子上学。例如固原41岁的回族同胞大华姐,因为自己和丈夫都是文盲,外出打工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返乡后,于2009年初为了孩子上学,甚至卖了一台农用车。其三,以自己经历激励孩子努力学习。肥东县自我雇佣小业主阿珍,只上过2-3年学,她对孩子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妈妈读书少,要是读书多,不开小卖部,开工厂了。”她的三个孩子,一个上大专,一个上中专,一个上初中。从她家庭中代际文化资本的迅速提升,可以看到打工生涯带给打工妹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其四,以新理念教育孩子。例如肥东县的小卫,回乡后发现在教育观念上,自己与家人存在着分歧。家里人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教育孩子就是老师和学校的责任,我们把孩子生活照顾好就可以了。她则不这么想。回乡后,她把

生活的重心放到孩子身上,非常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和心理健康,注意与孩子进行平等、积极、有效的沟通,并且努力营造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其五,希望孩子到城里接受教育。城市生活使她们看到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因此,几乎所有的返乡打工妹都表示,希望将来孩子到城市上学。其六,充当陪读妈妈。这是重视教育,不惜对子女进行大量教育投资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为了给孩子寻找优质教育资源,自己离开村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伴孩子读书,于是就成了专职陪伴孩子读书的陪读妈妈了。

②婆媳关系改善,开始学会宽容。调查地的妇联干部和返乡打工妹都告诉我们,现在婆媳关系改善了。对此,她们解释道,这是因为现在农民收入增加,不像过去那么穷了。实际上,婆媳关系改善不仅源于收入增加,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儿媳对婆婆家庭贡献的认知。我们在调查中获知,返乡打工妹认识到自己外出后婆婆对家庭包括照顾孩子、经营农业、处理家庭事务的多种贡献,“她们在家也不容易”,因而从内心深处增进了对于婆婆的理解乃至尊重。其二,儿媳在打工经历中学习的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包括理解和宽容。这种现代人的精神品质使她们开始学会与秉持不同文化的人和谐相处。

返乡打工妹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特别是她们活跃在农村的镇级社会中,成为推动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此外,她们为家庭角色注入了现代因子,从而为改善农村社会的文化品质做出切实的贡献。因此,她们实际上是在农村社会的基础细胞中引起了变迁。她们是变迁的媒介。

3. 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推手

女性因其多承担家人生活照料、儿童早期社会化的责任,在生活方式的传承、变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看到,返乡打工妹明显成为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推手。

(1)穿着时尚。在我们问到返乡打工妹对打工生涯的评价时,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许多人把“穿得跟上潮流了”作为自己重要的变化。“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坐标,包含了文化范畴及其社会等级的复杂图式。”^[21]衣着不止有保暖、遮羞的需要,还负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明显的符号性,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一个依据。人们在标志社会身份的衣着中追求着自己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这在爱美的女性那里更是如此。

因此,衣着与农村妇女的自信有着密切联系。在

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体面的衣着标志主人的身份,带给她们以自信;返乡打工妹小凤说,初到绍兴打工,“觉得自己穿得很土,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这是她在新环境中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障碍。我们的多数访谈对象在得到第一个月工资时首先是给自己买衣服。对于返乡打工妹,合乎潮流的衣着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生活体面、有尊严的信息,是她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也是她们求得社会认同的努力,是她们成功的标志。

(2)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洗澡:在河南省固始县,返乡打工妹说,她们每周会带着孩子到县城或镇子里洗一次澡。这是一个深刻变化。千百年来,农民没有一年四季洗澡的条件,也就没有洗澡的习惯。现在这种卫生习惯的养成,是农村生活条件改善、文明水平提高的表现。使用卫生巾:返乡打工妹,不仅使用卫生巾,而且注意卫生巾的质量,哪个牌子的卫生巾是不洁卫生巾是她们讨论的重要内容。

(3)会说普通话,语言举止文明了。我们欣喜地发现,返乡打工妹和我们都是用普通话交谈。现代社会交往的密度和频度对共同语提出了迫切需求,普及共同语,是建立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和实现信息化的基础性工程。

在贫困山区固原,返乡打工妹对我们会使用“你好”“请坐”等礼貌用语;酉阳土家族返乡打工妹小莲说到打工收获:“见生人不害怕了。如果没有出去打工,我看到你们肯定会害羞。”

有城市生活经验,衣着整洁入时,操普通话,心态开放,待人接物落落大方,这是我们见到的多数返乡打工妹的形象。她们是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推手。

4. 在精神层面,以下三方面的变化最值得引起注意。(1)发展意识增强。返乡打工妹普遍注意捕捉发展机会。如肥东县几个返乡的自我雇用小业主,或在家乡开建新安经济开发区时立即抓住政策优惠的机会,在开发区开小店,或者见家乡人要跑很远的地方洗澡,于是捕捉商机,开洗浴店。相应的,她们不再安于世世代代“土里刨食”的农耕生活,即使做全职家庭妇女,也总怀有再次外出打工的愿望。

(2)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我们到重庆调查时恰逢那里在推行“吉祥三保”——农村低保、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干部们发现,比起没有外出经历的人,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很容易理解保险的作用,一说她们就懂,而且很愿意接受,她们买保险非常踊跃。

(3)参与、合作意识强。重庆一位科研人员述说她准备在某农村做一个有关留守儿童教育的乡村工作室,一个返乡打工妹就特别感兴趣,说:“我到时候一定要来学习。”科研人员说:“那你把你村里其他当妈妈的都召集起来。”她说:“没问题!”这位科研人员还帮助联系一位返乡打工妹的丈夫到北京学习有机耕种,叮嘱说:“学好回来之后要带领大家一起做。”她马上就说:“肯定啊,这个事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并且说:“我们村里那个养殖大户各方面能力也挺好的,要不然也推荐他去吧!”

(4)有明确的政策需求。访谈中,返乡打工妹多次表示她们的下列愿望:①渴望家乡政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希望政府放宽小额贷款的政策以及其他支持创业的优惠政策,以求更好的发展。②希望家乡发展起来,使自己打工学来的技艺有用武之地。③希望政府营造一些信息交流平台,使返乡打工妹互吐心声,共谋发展。④希望有个好的带头人带领她们致富。例如酉阳县返乡打工妹小莲说,广东种经济作物很赚钱;家乡还种玉米,挣不到钱。要是有个带头人带领乡亲种经济作物致富就好了。⑤对于家乡政府的公共服务有了新的要求。

以上返乡打工妹的种种变化,均可看到城市文明在她们身上留下的印记:在她们身上,充分体现出“农村版海归”的特点。她们不仅把经济发展的新信息、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新经验、新体会带回家乡,而且把诸多生活新理念、生活方式也带回家。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近现代史表明,海归是认识世界的先锋,是变迁的媒介。返乡打工妹这个现代农村版的海归群体,一方面,她们携带着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新质,成为新农村发展的中坚。另一方面,从城市化的长时段来看,大批打工妹返乡是一种逆城市化现象,因而不是大方向。

1. 返乡打工妹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1)她们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中国急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镇的迅速发展,镇级经济体的膨胀,人口、资金、技术、设备向镇级集聚,是近年来的突出现象。而推动镇的发展又以返乡农民工为主。他们多集中于农村的镇,或创办企业,或从事第三产业。其中,返乡打工妹是推动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构成力量。她们以自己的优势,在镇级的服务业如照相、美发、餐馆、复印、小百货、小超市等行业最为活

跃。可以说,返乡打工妹是农村镇级发展的中坚力量。

(2)她们是农村发展所需的宝贵人力资源。关于人力资源储备的意义,阿玛蒂亚·森曾经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教育、扫盲、基本卫生保健以及居民寿命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许多人均GNP或实际国民收入远高于中国的国家大得多的成就。”“当中国最终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在教育上的成就以及劳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提高极大地便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返乡打工妹的人力资本处于闲置状态并不是好现象,但是,作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在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候,返乡打工妹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她们是传播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媒介。生活方式是人们满足自身生活需要、消费各种物质和精神文明文化资源的活动方式,它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一定的文化模式为依据。生活方式现代化内容丰富,简而言之,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精髓是生活方式反映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是其他。

生活方式现代化不是收入提高就可以自然实现的,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需要媒介的。例如,过去上海租界曾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明的窗口。对此,唐振常先生曾经有过精彩的描述:

这些物质文化设施,包括诸如服饰、生活方式,市政设施包括道路、煤气灯、自来水、电灯、电话、火车、公园、公共卫生等等,都和传统方式迥异。上海人对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羨,后继则效。一类是为了便利市政管理和重视卫生之举,如倾倒垃圾规定在上午九点以前倒在规定的地方;行人靠边行走,车辆靠左行驶;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等等,上海人则不能理解,一时不能接受。随处随时倾倒垃圾,早成习惯,今作规定,感觉不便。行人向来大摇大摆在马路中心与车辆并行,靠边行走以为并无必要。至于随地便溺,也是惯例,加以约束,乃感不便,粪桶加盖,在不理解卫生的意义以前,也觉多此一举。上海人所最感不理解并诧之为怪事者,莫如不准倒提倒挂鸡鸭。既然要杀来吃的,还讲什么人道主义^[21]

这里,租界和外国侨民成了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媒介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中国农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是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里,返乡打工妹起到了一定的媒介作用。著名社会学家、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滕尼斯

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新时代的精神》中,对女性对于社会生活文明程度提高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评价为文化的基本要素的整个高雅化和高尚化,首先要归功于妇女们和女性精神。”^[24]

(4)宽容品德的萌发。宽容是一种品德。现代社会的宽容,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价值。在现代多元的社会中生活,宽容和尊重他人是交往能力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品德。返乡打工妹在打工经历中萌发的宽容品德,对于提高乡村生活的文明品质意义重大。

考察我们的返乡打工妹,尽管她们的打工生涯不算长,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在她们身上,现代性在成长。这突出表现在婆媳关系的改善,反映了他们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人、尊重他人的现代人的品性。而对于女性而言,宽容与尊重的品性不仅使破解婆媳关系的千年难题看到了曙光,而且对于下一代人格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女性对于子女的伦理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滕尼斯说:“永恒的女性的伟大理智贯穿支配着每一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因而也支配着它们的历史,包括在伦理和审美教育的较高尚的领域里。”^[25]“教育始于母亲膝下。”母亲的现代性人格无疑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子女的心田,促成子女现代性的养成。

(5)重视子女教育是我们民族的希望。返乡打工妹极其重视子女教育的情况,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现代延续,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在我们致力于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努力中,返乡打工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打工妹大规模返乡是一种逆城市化现象 第一,返乡打工妹身上折射出我们城市化的欠账。城市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大方向。现在这种流动人口钟摆式地往返于城乡之间是违背城市化大方向的,有流动而无迁移的种种问题。集中反映在,她们因生育而过早地中断社会劳动生涯、退回家庭反映的是我们二元福利制度的不公正之处。令人高兴的是,使流动人口有序地定居城市已经进入我们城市化的政策视野,这让我们看到希望。

第二,奢侈的用工制度不可持续。我们在东南沿海的调查得知,企业最喜欢用18-22岁的女工:她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能耐受长时间连续工作,身体健康。而在打工妹一方,福利的缺位使她们不能在城市完成生育和抚育婴幼儿的生命过程,只得返乡生育。于是,表面上是她们自愿辞工回家,实则折射的是福

利排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东南沿海普遍的缺工现象已经表明,这种只截取打工妹最富于生命力5年使用的用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且不说她们拿到的只是生存工资。

今年的民工荒已经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这种用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这种模式的抵制,一种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着。

注释

[1]关于人口流动的阻力,刘根荣先生在《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当代财经》2006年第11期)中概括为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七种阻力。

[2]据段成荣的研究,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为125,进入21世纪后,流动人口性别比开始下降,2005年降到了101.17,基本达到了平衡。

[3]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给人口迁移下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

[4]见联合国网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6年所作《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之第1,2,253,68,61,249,251,250页。

[5]韩俊主编:《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第十一章“农民工回乡创业百县调查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

[6][15]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7]这次调查是2000年在全国进行的严格随机抽样获得的样本,有效样本19449份,农村样本9622份,有外出经历的364份。后者样本规模小,难以推论全国,但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二章,谭深:《外出务工与农村性别关系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调查中回流者样本只有78份,样本太小,只能从中分析一些与回流有关的要素,但不能解释全局。在这78份样本中,男性46人,女性32人。

[8]这里的“家庭原因”指“家里有事”、“家里需要钱”;“工作原因”指“在家乡找到/找不到工作”,“在外面找到/找不到工作”,“不愿意务农”。

[9]袁松等:《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北京》《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10]第二代农民工另有其独特之处,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中。

[11]白南生:《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李强主编:《中国社会变迁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2]朱玲:《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迁移工人生计的影响》,《北京》《比较》2009年第4期。

[13]朱玲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城乡住户家计调查样本中的子样本数据统计得出。资料来源: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报告”,2007年6月13日, www.molss.gov.cn/gb/news/2007-06/13/content_182044.htm。

[14]段成荣等人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分析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载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北京》《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16]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句富有哲理意味的歌词。

[17]所谓来料加工承包,是近些年在我国南方诸省出现的一种经营活动,其具体经营方式是由承包方与委托方签订合同,接受某产品的来料加工项目,负责按期提交加工产品。由于此类需要进行加工的产品大都是手工小物件,其来料加工技术含量低,没有什么工作条件限制,且简单易学,因此,来料加工承包经营的独特性及其魅力首先是非经济实体的个人作为承包方;其次是投资少、便于异地加工、包装运输;再有,承包人可以整个加工任务进行分层、切割、分离,动员居家的闲散人员以计件报酬的方式来参与来料加工活动。

[18]凡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返乡打工妹一般不住在本村,而是在镇上。这显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镇的集聚效应高于村庄,经济机会也多于村庄。

[19]在我们的调查地玉山县和肥东县,村民们认为,有本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能外出不外出是没有本事的表现,被人瞧不起。

[20]“个案3: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我最大的心愿”,甄砚主编:《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该个案主来自湖北,19岁,为初中文化,打工地是北京,旅店服务员。她的最大愿望是回乡办学,“希望家乡孩子不要受我这种苦。”在全国妇联2006-2007年对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的女性流动人口调查中,受教育不足是被反复提到的遗憾。在该调查的结集《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的一章“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录”中,有8名提到受教育不足给自己带来的限制,其中5名已婚有孩子者均表示,决心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不然,“那我的努力就白费了。”(同上书第225页。)

[21]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上海》《社会》2008年第6期。

[22]阿玛蒂亚·森:《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第二讲,2002年7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页。

[23]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研究论丛》1992年第7辑。

[24][25][德]斐迪南·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第128页。

[责任编辑:方心清]